

笔谈

吴介民
陈健民
巫堃泰
何祺锋
吴强
陈纯
何明修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3期
2024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民主的缺位 与香港自由的 死亡

编按：“东方明珠”香港，曾享有令人艳美的法治与自由。然而自1997年回归中国主权之后，其自由一直受到北京政权的威胁。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中国重回新强人统治之后，香港自由状况的恶化显著加速。而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以来，随着北京将国安法强加给香港，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法律成为系统性剥夺自由、迫害不同意见者的工具。大批民主人士或深陷囹圄、或流亡海外。最近，立法会又迅速完成了曾受到港人成功抵制的“23条立法”。

在回归中国主权20余年之后，自由的香港沦陷了。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呈现在世界面前。

关于香港，一度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判断，就是她有自由、缺民主。香港人为了民主进行了满怀激情的抗争，但是不仅没有得到期盼的民主，自由最后也丧失了。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的事件与因素？为什么在一个有深厚法治传统的社会，司法、执法系统会迅速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

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曾将香港视为可以效法的、“无民主但有自由”的范例，主张“先自由后民主”的发展路径。在自由香港沦陷的今天，如何评估这一看法？香港的沦陷对于台湾又意味着什么？

在《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雨伞革命10周年、反修例运动5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作为某种历史记录和分析。



吴介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协会成员）：现代民主的本质是问责。选举民主体制的安全阀，乃是透过定期的自由选举让人民有机会替换政府，而防止执政者滥权违法违宪。香港不论在

英国殖民时期或中国获得主权之后执行的内部殖民 (性质上是复返的中华帝国对香港的再殖民), 香港皆缺乏此民主体制的安全阀。

所以不难解释, 为何香港的司法与行政系统在如此短时间内, 被改造成执行中国专制镇压的工具, 因为香港当前的政治支配原则是由上而下的指挥, 原先有效率的政治机器, 很快地被切换到为专制者服务。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的“出走还是发声” (exit vs. voice) 理论, 香港社会中绝大部分对新统治者 (来自北京的中央政权) 可能造成压力的异议者, 要么被关在监狱, 要么被迫流亡 (exit), 因此, 抗议者都无法在香港现场进行抗争 (voice), 因此原先已经相当程度 (去政治化) 的科技治理官僚就更倾向归顺中央 (loyalty)。

香港在英治后期的体制, 曾经被称许为“无民主之自由社会”, 而“先自由、后民主”也被认为是可行之道。这个迷思需要破解。

首先, 所谓“先自由、后民主”的政治演化路径, 历史上的案例是宪政主义下的英国道路。这条演化路径是英国保守主义传统下长期渐进改革的轨迹, 是特例而非常态 [参见汤马斯·H·马歇尔 (Thomas. H. Marshall) 对英国公民权渐进演变分析]。历史是否可以如此复制? 或者相反, 香港自由的急剧沦陷, 再一次验证了自由 (法治) 和民主的共构性; 也让人提问: 在民主缺位下, 自由和法治是否可能在香港 (再度) 出现? 即使出现, 可持续吗?

根据林茨 (Juan Linz) 和斯泰潘 (Alfred Stepan) 关于主权国家作为民主巩固前提的理论, 香港在一个高度威权的中央的统治下, 难以在局部地区 (一

个特区)产生民主,因为这将造成中国中央统治地方的难题。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下,香港一旦置于中央严格控制下,下一轮的民主机会,在于中国的政体转型或民主化。

第二,所谓自由法治的香港,法治是港英很后期才建立,直到1970年代仍贪污横行,何来法治。回顾香港在切换主权者后不到二十年,人民的自由权(civil rights)就遭到掏空、割除,不仅让人怀疑,原本所谓的自由程度恐怕被高估了。罗永生曾质疑说,港英治理下的香港拥有的是“虚拟的自由”,回顾起来有几分道理,而与殖民者共谋产生的权力结构,不就被中共吸纳挪用了吗?

第三,其实,早在港英统治后期开启政治参与窗口的机会时,民主派人士在1986年就成立了“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简称“民促会”)争取“八八直选”,倡议建立民主政制和实现百分之百的港人治港。那一代的民主派应早已体认自由与民主的共构性。

香港民主化不断地被延迟,从港英最后阶段直到中国拿回主权的前十多年。2014年争取普选运动,进而爆发为雨伞抗争,目标是要求中国政府履行“真普选”的承诺。但中国当局以“人大831决定”回应,北京这个决策几乎注定了后来的抗争激进化、破局、与全面镇压,进而让北京提早改造香港政治体制。这是一个“香港被背叛”的故事。

第四,在英治后期兴起的政治社会(政党活动空间)和公民社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政治社会高度依附于既有政治体系的游戏规则,一旦新的殖民政权决定镇压,并且改变规则,反对党就会一蹶不振,甚至连建制派政党

都遭压制改造。公民社会的溃散，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固然是新政权的无情打压，另一方面则与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港英殖民政权因需要社会沟通与社会控制，而且早期社会福利功能不完备，而将部分需求转由公私协力的社会团体来履行，因此在此环境下长成的公民社会，其协作性高于对抗性，因此较易遭威权国家的镇压。对照之下，如果公民社会在和外来政权或威权国家进行政治对抗中形成，其性格就较为强悍。（作者感谢梁启智阅读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



陈健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原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2019 反送中运动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与极权体制的对决，结果一国两制灰飞烟灭，中国也必然会付出代价。

该运动本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但因港府对百万民众上街视而不见，再次激起争取普选的诉求。香港早在 1980 年代中已有民主运动，当时港府以社会未作好准备为借口，拒绝让港人选举立法局议员。

有关民主的先决条件，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与达尔 (Robert Dahl) 曾指出，经济发展至某一水平将会促进民主。但像印度如此贫穷的国家亦能实行民主，可见设定民主化的最低 GDP 水平意义不大。反而林茨和斯泰潘提出巩固及深化民主制度的五项条件——市场经济、政治社会（政党及选举制度）、公民社会、法治及有绩效的行政系统——更有参考价值。用这框架去看，香港除了政治社会以外，早已具备充分的民主条件。试想一下，历史上哪个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已拥有如香港般自由的市场经济、活跃的公民社会、成熟的普通法和廉洁而有效率的公务员队伍？

香港一直未能发展民主体制，主要是因为英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的阻挠和商界的反对。即使香港的政治模式被冠以开明专制，放在如此成熟的社会环境亦难免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难以满足参与的诉求。老一辈港人目睹中国的乱局，多会视香港为避风港，少理政事。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中产阶级使公民社会日渐壮大。在 2003 年 50 万人游行反对《基本法》23 条立法后，更多人意识到要争取普选才能捍卫自由。新生代更乘着互联网的浪潮，有更大的能量参与政治讨论和进行动员。

2014 年的雨伞运动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分水岭，120 万港人在不同阶段参与了 79 天的占领行动。虽然政府曾以催泪弹甚至纵容黑社会攻击民众，人们仍坚持和平抗争。结果北京先以白皮书说明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再以人大常委 831 决定彻底消灭港人对民主的幻想。经此一役，多年来支撑温和民主路线的“民主回归论”宣告破产。既然在一国两制内无法实现民主，崛起的“本土派”相信“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倡议“香港独立乃唯一出路”。此外，既然“和理非”策略无法成功争取民主，新生代只好去支持“勇武抗争”。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是“和勇不分”的全民起义，虽是可歌可泣，却以镇压告终。中共不惜摧毁一国两制，除了觉得局势已经失控，亦反映中共的“制度自信”已走火入魔。当年邓小平在港实施一国两制是秉承周恩来长期以来的想法，借助香港促进中国经济和学习资本主义先进制度。但习近平真的以为中国已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中国模式甚至比西方民主更为优越。从民族自卑突变为自大狂妄后，消灭一国两制，中国梦才能自圆其说。

事实是，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再上一层楼，须靠更健全

的制度环境，包括法治、企业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廉洁政府等。香港本来可为此作出贡献，中共却一手将之摧毁，真是愚不可及。

有人说向中共争取民主是缘木求鱼，港人硬闯只会玉石俱焚。韩东方当年说 1989 年民运是一场悲剧——树上的果子虽未成熟，但人民饿得太久，就算吃了肚子痛，还是会伸手去摘。香港的情况，却是果子早已成熟，且有承诺说果子归于人民，伸手去摘是自然不过的事。如果这也竟然导致一场悲剧，显然错不在港人。



巫堃泰（利兹大学政治研究员，原香港屯门区议会议员）：

自 2020 年 6 月《国家安全法》被纳入香港《基本法》以来，北京对香港自由的镇压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对北京拆解香港民主阵营及其支持者——公民社会的行为作出反应，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北京的举措，并制定政策接纳希望移民的香港人。尽管国际社会为香港人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和庇护，但自由世界应该从香港沦陷的痛苦教训中吸取经验：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北京压制香港自由视而不见，不仅未见成效，反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早在 1995 年，北京就拒绝让全体民选立法会议员在 1997 年后继续完成任期，这显示了对民主制度的不尊重。自北京接管香港以来，临时立法会填补了政治真空，撤销了集体谈判权，并恢复了限制集会权的法律。2003 年，50 万香港人反对《基本法》23 条立法的游行迫使北京暂停了明显的压制。但 2010 年以来，当北京的宠儿梁振英成为特首时，镇压行动又开始恢复。从禁止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党，到因违反严格的抗议法而监禁抗议组织者，再到因宣誓就职不诚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这些都表明香港的自由在倒退。

尽管如此，自由世界却专注于在中国的（经济）机会，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关注甚少。例如，曾统治香港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正处在与中国的“黄金时代”，在其半年一次的香港报告中称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基本得到了遵守。只有台湾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期间将中国对香港的威胁公之于众。

民主阵营在2010年关于宪政改革方案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分裂的阵营。代表民主党的议员获得了支持政府的好处，如在立法会中获得新设的席位及其党派成员被任命为政府不同咨询机构的成员。该派系甚至支持赋予立法会主席驱逐所谓行为不端的同僚的权力，专门针对反对宪政改革的社民连议员。

反对派的内斗在雨伞运动后因本土主义的崛起而加剧，进步的本土派和反中本土派进入了政治舞台。两个派系都指责温和派“失败的30年”，因为他们未能向北京施压以实现香港的民主化。

虽然整个民主阵营在2019年可能团结起来，但自2010年代以来的内斗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使其在北京决定对他们采取强硬手段时未能变得更加有韧性。如该阵营采纳谨慎意见并制定退出策略，一些悲剧事件本可以减轻、甚至避免，如对47名非官方初选组织者和候选人的迫害。

2020年，一名香港人举着“请珍惜你的选票，我们只能示范一次”的标语，深深打动了台湾人的心。当时，蔡英文总统以创纪录的票数击败了亲北京的国民党候选人。她在选举活动中提到香港，警示了台湾如果向北京屈服，将会重蹈香港的覆辙。

香港给世界带来的启示，就是专制者迟早会压制其治下的政治体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曾经多么充满活力。事后看来，珍视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人应该及时应对民主倒退，增强对抗专制的韧性，建立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以避免内斗；更重要的是，防止政治投机者以民主制度和亲民主运动为代价谋取利益。香港已经证明过一次，这种痛苦的经历不应被白白浪费。（余浩风翻译）



何祺锋（独立政治分析人，现居加拿大）：香港的历史是殖民遗产、本地身份形成和中英关系动态变化的一个见证。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标志着—一个以合作、繁荣和逐步形成的香港人身份为特征的叙事的开端。我想探讨香港身份的演变，特别是在 1997 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以及习近平的国家复兴愿景所带来的挑战。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诞生，体现了当地居民与殖民当局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清朝战败的背景下，香港成为了本地居民和移民寻求机会和繁荣的避风港。这些多元人群的涌入，逐渐促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香港人身份，其根基在于粤语语言和文化的保存。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成为了保存和传播粤语语言 and 文化的堡垒，这些文化成为了不断发展的香港人身份的核心。尽管中国大陆邻近地区的普通话逐渐占据语言优势，粤语在香港仍保持其显著地位，塑造了香港的语言和文化环境。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催生了粤语在香港独特的发展轨迹，与广州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促进了独特认同感的形成。尽管中国本身具有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香港在定义和向世界展示一个超越语言和地域界限的独特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7年7月1日的主权移交，标志着香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同时也是其治理框架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一转变促使人们重新评估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身份，揭示了两者在愿望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

最初，香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很高，促使中国共产党采取不干涉政策，保留了特别行政区 (SAR) 的自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香港与北京之间经济差距大大缩小，意味着两者关系必然会调整，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对包括涉及香港在内的国家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习近平和中共的角度来看，香港独特身份的延续，对中国统一的愿景构成了挑战。因此，中共大力将香港纳入中国国家体制，导致中国专制的强化、香港的大陆化，香港的自由和治理结构被严重侵蚀。

香港的最新发展反映出与传统国家安全概念的背离，因为习近平追求统一中国的目标——以单一的领导、意识形态和身份为基础——与香港人对自治和自决的追求发生冲突。对自由和异见的打压，表明北京决心强制执行统一、推行专制，即使以牺牲香港珍视的自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最终，香港的命运，体现了在香港和中国存在民族复兴的不同的愿景之下，自治与统一、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复杂的紧张关系。



吴强（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在2021年底那场惨烈的镇压之后，香港“选举”出了一个警察出身的特首和翼赞体制的立法机构，这个新机构先后通过了《国安法》、完成了《基本法》的第23条立法，香港法庭继续

审理“反送中”运动期间抓捕的大批民主人士。在这个背景下，几乎没有人会怀疑香港的有限民主已经终结，香港的自由也趋向死亡。

不过，如果纠结于民主与自由的简单关系，就很难跳脱历史主义的窠臼，也难以认清香港目前面临的困境。譬如，太多讨论都以为香港殖民地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曾经促进经济发展，那么也将保持未来香港活力。这正是北京当局对港政策的历史主义假设，即一个民主缺位的经济自由体仍然可能对资本有吸引力。这与新冠疫情结束后整个中国内地的经济恢复政策所秉持的假设几乎一致——把有限的经济自由当作“优惠性”政策，试图营造一个虚假的复苏气氛。

然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香港，不仅是一个所谓“世界金融中心遗址”，更是一个公民社会被消灭的城邦遗址。从2022年至今，香港行政当局以公民社会为敌，除了慈善、环境等，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大部被迫解散，香港民主沦丧的同时沦为社会荒漠，正在退回殖民状态，方便分而治之。

历史上，的确，直到很晚近香港都与公民社会无缘。一方面，从香港开埠以来，特别是1845年第一号法例，港英警方的对付重点一直是三合会为代表的华人秘密会社，而从乾隆时代的天地合演变出来的三合会及其各种现代分支，才是时至今日香港传统底层社会的主要形态，也是内地人民对香港社会的浪漫想象载体。但是，大部分时间里除了1953年政治部递解向前等人到台湾，香港警方对三合会都采取容忍态度，只有在“中英联合声明”后的1985年才开始全力打击。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香港自由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即战后四十余年的

冷战岁月，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始终被港英殖民当局严厉控制，这与内地人民对香港的自由想象截然不同。例如 1951 年的“出版条例”，严格禁止任何有关社团和政党的煽动、以及所谓“假新闻”，并有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而结社登记完全被警务处控制，“警察条例”对暴动的严苛定义也算罕见。

相比之下，过去几年香港特区警方将重点转向公民社会团体，且手法和烈度远超港英殖民时期。虽然镇压法例沿袭旧法，但针对公民社会的“严打”模式几乎克隆内地和“茉莉花革命”后内地对公民社会和边疆地区的镇压模式，不乏冷战期间“肮脏战争”的色彩。其结果，与其说因此香港正在退回殖民状态，不如说香港正在退回“真空家乡”的前现代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体缺位的城市，香港的民主徒剩形式而已，背后是全过程的操控和对社会自组织的恐惧，全然不同于英国殖民晚期的特许式有限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也因此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的自由。

而在这场大规模镇压和此前大规模抗议运动中高光亮相的香港公民社会，比如至今仍在押受审的以黎智英、邹幸彤等代表的自由媒体和人权机构，则同步于 1989 年苏东阵营解体进程中东欧政治公民社会的形成，诞生在声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中。如同三合会、哥老会等晚清秘密会社积极卷入近代民族革命一样，香港各界精英也在卷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过程中，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产生了现代公民社会，改造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才有冷战后三十余年香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和魅力，才有香港人民在 1997 前后逐渐的民主觉醒和自发的自由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香港的公民社会正是香港民主的温床，也就是香港

本土在剧变时代所新生的内部结构，可能更为准确，更有利于帮助世界理解香港人民的苦难和香港“自由”的困境。



陈纯（独立学者、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我从小在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地方长大，若说 1990 年代在广东长大的小朋友有什么特别，那就是受到香港文化的熏陶极为明显，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香港的自由文化和法治文化。我们对香港警察那句“而家唔系势必要你讲，但系你讲嘅一切将会成为呈堂证供”倒背如流。从香港无线电视 (TVB) 的律政剧那里，我们知道了“无罪推定”和陪审团制度，这一切都和大陆截然不同，但于我们却又自然而然。

对于我，还有一层更深的联系，那就是对于香港政治的关注，以及因为它而改变命运的那段经历。说来惭愧，我对香港政治的关注，并不是原生性的，而是从学术中派生出来的。我硕博的学术经历，与香港的政治哲学学者密不可分，他们既是我的授业恩师，也影响了我的学术进路。毫无疑问，他们对“我城”命运的深度参与和思考，同样对我有很大的触动。

2019 年反送中期间，我因为去香港进行政治和学术观察，被人把照片发上微博，冠以“港独”的罪名，网暴上了热搜，并遭到当地警方的传唤。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被多个部门不定期骚扰，并且被莫名限制出境的生活。而在 2019 年以后，尤其是随着《国安法》的出台，香港昔日的自由与法治已丧然无存，彻彻底底“大陆化”。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和香港的命运有着莫名的呼应。

从 2015 年开始，我便对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在其

中发现了一种渐进改良的集体思路，反映在政治哲学上，那就是倡导“自由先于民主”，或者“法治先于民主”，并且认为威权与法治和部分自由可以并存。在大陆的语境，这意味着自由派的着力方向，应在于首先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和法治化，如经济自由（有时也包括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而不应过早提及民主改革或者要共产党交出权力。“自由先于民主”的案例，亚洲四小龙都常被提及，但因为香港在 1997 年就已回归中国，所以香港的借鉴意义更大。在 2014 年以前，大陆的自由派对于香港有着美好的期待，希望它能在普通法体系和基本法的基础上，渐进地实现民主，给中国大陆做一个榜样。但 2014 年全国人大的 831 决定让这个期待彻底破灭，香港也进入了以社运推动民主的阶段，终点就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

“先法治后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这至少包括：不存在一个可以宰制各方的权力集团，以及社会各群体对法治的信仰。当年的韩国和台湾，其政府受到美国的掣肘，而新加坡至今尚未充分实现民主。就香港而言，港府固然无法宰制各方，但港府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却可以。事实上，香港最终的命运，证明了所谓对法治的信仰，在铁齿铜牙的权力面前有多么脆弱。短短几年间，香港的公务员对法治的尊重早已荡然无存。

如今我已 5 年没有去香港，而在 2019 年之前，最频繁的时候我一周去一次香港。我对现在的香港的了解，基本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朋友的讲述，比如香港书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比如有球迷因为没有唱国歌而被捕。有时我甚至希望，我看到的听到的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景象，香港依旧如初。



何明修（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这里只谈谈台湾失当的援港政策。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确定香港移交，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因应方案，包括提供“港九反共忠贞侨胞”之随时返国的安排。然而，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对于香港人没有吸引力。八九六四之后的中产移民潮以加拿大、澳洲、英国等为主，选择落脚台湾的并不多。

在2020年6月，因应港版国安法，台湾的陆委会所推出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承诺了一堆港人就学、就业、投资创业、移民定居之协助。与36年前相比，台湾已经民主化了，而且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台湾的公民社会积极声援，也让许多民主派的香港人感受到温暖。最明显的例子即是2020年1月的总统大选前夕，寻求连任的蔡英文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造势大会，许多香港人参与其中，他们激情挥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仿佛他们也参与了这场选举。

按理来说，面临人口老化的台湾，应该欢迎文化上相近的香港移民，他们的技能与资金能提振经济。香港拥有台湾欠缺的金融与法律服务，共同的民主信念也应有助于他们融入台湾社会。结果并非如此，许多移居来台的香港人感到失落，取得身份证（亦即所谓“定居”）相当困难。因此，当英国放宽国民（海外）护照的申请资格与居留许可，加拿大与澳洲推出了救生艇方案，不少在台的香港人选择了二次移民。

台湾失当的政策主要有两点，分别是对于投资移民与逃亡的抗争者。

台湾原先就对于香港人采取较优惠的移民政策，只需要600万投资，相对

于外国人所要求 1500 万元。但是官员认为管道太过宽松，在 2020 年要求有实体店面，并且经营两年。门槛提高之必要性或许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港人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国安审查，尤其是中国大陆出身、曾在中资机构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申请案需要联席审查。

根据陆委会的数据，港人获得定居高峰是 2021 年的 1685 人，之后两年则是减少为 1296 人与 1432 人。由于官方没有公布申请人数，无法得知具体的批准率，可以确定的是获准人数不增反减，这显示官方尺度趋严。台湾政府在意移民的政治忠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粗暴的一刀切裁量、不断的补件要求与延宕、前后不一的标准，让许多港人失望。事实上，如果采用入籍效忠宣誓的措施，可以减缓这方面的忧虑。

抗争者通常是较年轻的香港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投资移民的管道，台湾政府的因应也仅只于所谓的专案处理。逃难来的香港人是用观光签证入境，最多只延长至六个月，政府鼓励香港人就读台湾的学校，以留学签证取得较长的居留资格。但是不少香港人并不想要念书，而且取得学籍之后，他们的工作时间受限制，难以经济自主。根据规定，香港人要读满四年大学，再工作五年，且最后一年的薪水要达到基本工资的两倍，才能取得身份证。对于有能力独立谋生的香港人，台湾政府也是拖到 2022 年才以“获准居留之难民”名义容许港人就业。

台湾不接纳政治难民，官员也避免使用庇护的名义，最主要的考虑是不想得罪中国政府。陆委会在 2022 年中提出“就业定居”方案，折抵就读时间，加速港人取得身份证的时程，但是由于执政党内部的反弹，最后无疾而终。

台湾错失了一个善用民主软实力的契机，对于处于威权扩张前线的台湾，这样保守的心态并不利于争取国际民主阵营的认同。执政者应该扬弃狭义的两岸关系之框架，以全球地缘政治的制高点视野，处理未竟的援港人道专案。



默鷹画作